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海洋生态保护白皮书英译分析

——以《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濒危海洋生物语料为例

张绍伟*, 刘 爽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 保定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8日

摘 要

生态主题外宣文本不仅传递治理事实, 也参与生态价值、责任主体与国家形象的跨语际建构。本文以《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及其英译文中濒危海洋生物语料为对象, 采用目的性抽样, 并结合定性细读与小规模平行语料辅助观察, 在生态翻译学与生态话语分析融合视角下考察生态意义重构。研究以“三维转换”为框架, 将及物性过程、参与者配置、环境成分和生态价值取向纳入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分析。结果表明, 语言维上, 译文通过过程类型和参与者重组呈现治理行动与保护责任; 文化维上, 通过解释性转换、伦理化保留和术语化表达再现自然观和生命观; 交际维上, 通过主体显化、数据保留和合作叙事提升信息清晰度、科学可信度与传播效果。总体来看, 译文具有有益性生态话语特征, 能够强化人与海洋和谐共生、尊重非人生命体和推动全球海洋治理合作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生态话语分析, 三维转换, 海洋生态保护, 白皮书英译

An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White Paper on Marine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A Case Study of the Corpus on Endangered Marine Species in Marine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Shaowei Zhang*, Shuang Liu

*通讯作者。

Abstract

Eco-themed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texts not only convey governance facts, but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cross-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values, responsible actors, and national image. Taking the white paper *Marine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especially the corpus concerning endangered marine spec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adopts purposive sampling and combines qualitative close reading with small-scale parallel-corpus-assisted observation to examine the re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meaning from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With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study incorporates transitivity processes, participant configuration, circumstantial elements, and ecological value orientation into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dimension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 the linguistic dimension, the translation presents governance actions and protection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process types and participant restructuring; i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t reproduces the source text’s views of nature and life through explicative transformation, ethical retention, and terminological rendering; in the communicative dimension, it enhances informational clarity, scientific credibility,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s through subject explicitness, data retention, and cooperative narration. Overall, the translation displays features of beneficial ecological discourse and reinforces the value orientations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the ocean, respect for non-human life, and cooperation in global marine governance.

Keywords

Eco-Translatology,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Marine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hite Paper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议题。海洋维系地球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也关系人类文明延续、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全球共同发展。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生态保护话语逐渐成为中国外宣文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白皮书作为政策型外宣文本,一方面呈现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成效,另一方面承担着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立场、传递中国海洋治理经验和建构国家形象的功能。其英译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生态理念、治理行动和责任意识进入国际语境的再表达过程。

《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1]集中呈现了中国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保护地建设、珍稀濒危海洋生物保护、海洋资源养护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理念与实践。文本中既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海和谐共生”“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等生态文明话语,也有关于海洋保护地、濒危物种、种群恢复和国际合作的具体表述。这类文本的翻译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术语是否准确、句式是否通顺,更在于译文如何呈现海洋生态价值,如何安排生态责任主体,如何保留濒危海洋生物的生命性和可

感性, 又如何面向国际读者实现有效传播。

现有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生态话语分析关注语言如何建构人与自然、人与非人生命体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态关系, 能够揭示话语中的生态价值取向、责任分配和生命表征。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在特定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与选择, 常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分析译文转换方式。前者长于解释生态意义如何在话语中生成, 后者长于说明译文如何在不同维度上进行适应性选择。二者结合后, 可以进一步追问生态意义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被保留、强化、弱化或重构。

基于此, 本研究以生态翻译学和生态话语分析的理论融合为研究视角, 将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作为总体框架, 将生态话语分析的过程类型、参与者配置、环境成分和生态价值判断融入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之中。语言维重点考察译文如何通过动作过程、关系过程、言语过程和参与者重组呈现生态治理行动、保护对象和责任主体; 文化维重点分析自然观和生命观在英译中的再现方式; 交际维关注译文如何通过主体显化、数据保留、句式重组和合作叙事实现生态外宣效果。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 并结合定性细读以及小规模平行语料辅助观察方法, 围绕典型中英平行语料展开细读, 力图揭示译文中语言形式、文化理念和交际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

与一般生态新闻或环保标语不同, 白皮书英译面对的受众更为复杂, 既包括国际组织、政府部门和研究者, 也包括关注海洋治理议题的普通读者。文本既要说明事实, 又要传递立场; 既要保持政策文本的庄重性, 也要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由此, 本研究的研究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 译文如何通过语言形式重组生态行动和责任主体, 如何跨文化再现中国生态文明理念, 如何在国际传播中建构可信、合作的海洋生态治理形象。这样的设问使研究能够从微观语言进入宏观话语功能, 避免把白皮书英译简单处理为术语对译或政策句式转换。

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具有濒危海洋生物保护指向的中英平行语料。这样既能避免研究主题过散, 也能使理论融合落实到较具体的生态主体和翻译现象之中。

2. 文献综述

2.1. 生态话语分析研究

生态话语分析关注语言如何参与建构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体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态关系。Alexander 和 Stibbe [2] 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重心从“生态话语的分析”推进到“话语的生态分析”, 强调研究对象不应局限于显性环境文本, 而应进一步考察各类话语对生态认知和生态实践可能产生的影响。Stibbe [3] 提出“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 从框架、隐喻、评价、身份、遮蔽和突显等层面揭示话语对生态观念的塑造作用。在动物话语研究中, Stibbe [4] 指出, 动物在话语中常被抽象化、资源化或符号化, 由此可能丧失作为生命个体的可感性。这一观点对濒危海洋生物保护文本具有启示: 翻译分析不能只看物种名称是否译准, 还应追问译文是否保留海洋生物的生命性、脆弱性和生态主体地位。

国内生态话语分析多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重要理论资源。何伟、张瑞杰 [5] 建构生态话语分析模式, 将及物性、语气、情态、评价、主位和信息系统纳入生态意义分析, 并据此区分生态保护型、生态破坏型和生态模糊型语篇。何伟、魏榕 [6] 进一步从国际生态话语出发, 对及物性系统中的参与者角色和过程类型进行细化, 为识别话语中的责任主体、受动对象和生态取向提供了较清晰的操作路径。及物性分析并非只是语法层面的过程识别, 而是能够揭示“谁在行动”“行动指向谁”“责任如何分配”“生态关系如何被建构”等深层问题。

和谐话语分析体现出较鲜明的中国语境特征。黄国文 [7] 将其概括为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服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生态分析模式。赵蕊华、黄国文 [8] 进一步阐释良知原则、亲近原则和制约原则与经验、人际、语篇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 使和谐话语分析具备较强的方法可操作性。近年来研究逐渐从宏

观生态理念转向具体生态主体的语言表征。李珂[9]强调自然实体的生命性和施事性不应被语言表达削弱; 苗兴伟、李珂[10]指出范畴化和视角化策略能够建构人类主体与自然主体之间的共情关系和共同体关系; 匡芳涛、郭璨、邹秀估[11]发现野生动物保护类标语中物质过程、关系过程和心理过程共同承担宣传、警示和价值引导功能。这些研究表明, 生态话语分析已经能够较细致地解释不同语言资源如何建构生态价值, 但其对象仍多集中于单语话语、环保标语、教材话语和新闻话语, 对政策型生态外宣文本中的翻译转换关注不足。

就本研究研究对象而言, 白皮书同时具有政策说明、生态知识传播和国家形象建构三重属性。其语言并不追求文学化表达, 而是依靠制度术语、过程链条、数量信息和价值判断来组织意义。这意味着, 研究者不能只从修辞效果判断译文优劣, 也不能只比较中英词语是否一一对应。更恰当的路径, 是把生态话语分析中的过程、参与者和生态价值判断引入翻译研究, 考察译文如何在新的语言环境中重新安排行动、责任和生态关系。

2.2. 生态翻译学研究

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研究生态转向与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构语境中逐步形成的本土译论。胡庚申[12]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 将翻译理解为译者在特定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与选择活动, 为生态翻译学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此后, 胡庚申[13]系统阐释“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适应选择”“三维转换”等核心概念, 使生态翻译学从方法性解释走向理论体系建构。胡庚申[14]进一步从范式层面论证翻译研究“生态范式”的成立, 指出生态范式回应了既有语言学范式、文化范式在整体性、关联性和动态性方面的不足。

“三维转换”是生态翻译学在文本分析中较常用的路径。语言维关注译文在词汇、句法、语篇结构等层面的适应性选择; 文化维关注源语文化内涵在译语文化中的保留、转化和再表达; 交际维关注译文是否实现预期交际目的。该框架为生态主题外宣文本研究提供了清晰层次。问题在于, 部分应用研究容易将“三维转换”处理为翻译策略分类, 即分别讨论词汇怎么译、文化词怎么处理、传播效果如何实现, 却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些转换与生态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生态翻译学能够回答“译文如何适应”, 但还需要补充一个问题: 这种适应如何影响生态意义的建构。

这一问题也关系到生态翻译学应用研究的深化。若“三维转换”仅被理解为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清单式项目, 研究便容易停留在策略枚举层面。面对自然生态文本, 尤其是濒危海洋生物保护文本, 译文中的主语选择、过程类型、数据呈现和隐喻保留都可能改变生态意义的重心。翻译研究需要解释这些改变, 而不只是描述它们。因此, 生态翻译学需要与能够处理话语价值和生态关系的分析工具结合起来。

近年研究中, 生态翻译学的理论重心开始由“喻指”研究向“实指”研究拓展。胡庚申指出, 生态翻译学中的“虚指”主要是通过隐喻类比将生态学理念投射于翻译研究, 而“实指”则指向“自然生态作品和特定绿色主题的翻译行为和翻译研究”[15]。这一界定使生态翻译学从对翻译生态的理论阐释进一步进入自然生态文本、绿色主题文本和生态文明话语的翻译实践。现有应用研究多集中于黄河生态文化、地方名胜简介、旅游公示语、地名英译和新媒体外宣等领域, 对濒危海洋生物保护文本的关注仍较有限。此类文本既具有自然生态主题, 又承担生态知识普及、保护伦理建构和国际传播功能, 处于生态翻译学“实指”研究与绿色翻译研究的交叉区域。

2.3. 理论融合路径

生态翻译学和生态话语分析虽然分属翻译研究与话语研究, 但二者在生态整体观和关系性思维上具有相通之处。生态翻译学将翻译活动置于语言、文化、交际、译者、读者和社会语境共同构成的翻译生

态环境中, 强调译文生成是多因素适应与选择的结果; 生态话语分析则将语言视为生态关系建构的重要资源, 关注话语如何影响人与自然、人与非人生命体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二者的理论重心并不相同: 前者重在解释“译文在何种翻译生态中如何转换”, 后者重在追问“转换后的话语建构了何种生态意义”。正因如此, 二者的结合具有必要性。若仅依赖生态翻译学, 分析容易停留在语言、文化和交际层面的转换描述, 难以进一步判断这些转换如何影响生态价值取向、责任主体配置和生命表征; 若仅依赖生态话语分析, 研究虽能揭示话语中的生态意义, 却难以充分说明这些意义在跨语际转换中如何被保留、调整、强化或重构。二者结合后, 翻译研究才能从策略层面的“如何译”推进到意义层面的“译后建构了何种生态关系”。

这种融合不是两个理论的简单并列, 而是需要建立层级清晰、功能互补的分析关系。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可以作为外层框架, 确定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分析范围, 解决译文转换发生在何种层面的问题; 生态话语分析则作为内层解释路径, 进入每一维度的具体分析, 回答这些转换如何参与生态意义建构的问题。在语言维中, 及物性系统能够解释译文如何配置动作过程、关系过程、言语过程以及参与者和环境成分, 从而揭示生态行动主体、保护对象和生态成效的前景化方式。在文化维中, 隐喻、评价、身份和生命性表征的研究能够帮助判断译文是否保留源语中的自然观和生命观。在交际维中, 有益性话语、生态价值取向和话语功能的判断则有助于解释译文如何通过信息清晰化、数据科学化和合作叙事实现生态外宣目的。由此, 生态翻译学提供“维度安排”, 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价值解释”, 二者共同构成本文的理论分析路径。

已有研究已经分别证明两种理论的解释力, 但真正将二者用于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外宣文本英译研究的成果仍较有限。生态话语分析多关注生态意义在单语文本中的建构, 生态翻译学研究多关注译文在三维转换中的适应性选择。二者之间仍存在一个需要打通的中间环节, 即生态意义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发生跨语际转换。本文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下展开研究。以《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为语料, 本文将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视角与生态话语分析的微观分析逻辑相结合, 考察译文如何在语言维上重组生态行动和责任主体, 在文化维上再现自然观和生命观, 在交际维上通过事实呈现、数据保留和合作叙事实现生态外宣效果。这样处理的意義在于, 研究对象不再只是译文形式是否准确, 而是译文形式如何参与生态意义、生态责任和生态主体关系的重构。

这种融合还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濒危海洋生物保护话语既涉及物种命名、栖息空间、种群变化等科学信息, 也涉及保护责任、生命伦理和国际合作等价值判断。单一理论难以同时处理“翻译转换层面”和“生态意义层面”两个问题: 生态翻译学能够提供翻译研究的维度安排, 说明译文在不同层面上如何进行适应性选择; 生态话语分析则能够进一步解释这些语言选择如何影响生态主体的可见性、保护责任的分配和生态价值的呈现。二者共同作用, 使白皮书英译研究能够从“译文是否准确”推进到“译文如何跨语际建构生态关系”的层面, 也使本文的分析不止于翻译策略分类, 而能够揭示翻译转换背后的生态意义重构机制。具体的融合路径见图 1。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语料

本研究语料来源于《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及其英文译文[1]。该白皮书系统介绍中国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保护地建设、珍稀濒危海洋生物保护、海洋资源养护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理念与实践, 兼具政策性、说明性和外宣性。与一般环保文本相比, 白皮书不仅呈现生态治理事实, 也承担对外传播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和海洋治理立场的功能, 因而适合作为生态翻译学与生态话语分析结合研究的语料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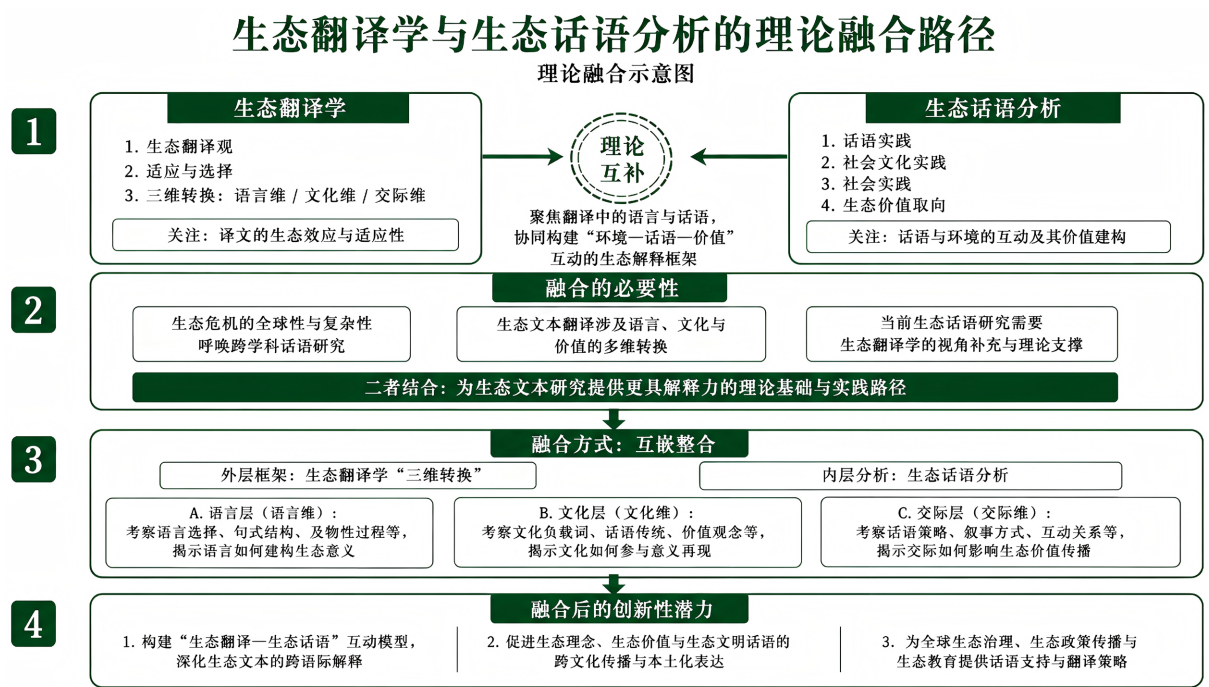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pathway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图 1. 生态翻译学与生态话语分析的理论融合路径示意图

鉴于本研究关注的是生态主题话语在英译过程中的意义转换，而非对白皮书全文进行全面统计，语料选取采用目的性抽样。为降低目的性抽样带来的主观偏差，本研究采用“全文检索—主题筛选—中英对齐—人工复核”的语料处理步骤。首先，以白皮书中英全文为基础，检索与海洋生态保护和濒危海洋生物相关的关键词及表达，包括“珍稀濒危海洋生物”“海洋生物”“重点保护物种”“斑海豹”“中华白海豚”“海龟”“珊瑚”“海洋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种群恢复”“增殖放流”“国家保护行动计划”“国际合作”等。其次，对检索结果进行主题筛选，只保留与海洋生物保护、保护空间、物种命名、种群变化、保护行动、责任主体以及合作治理有关的片段。再次，将中文原文与英文译文按句群或者小句进行对齐，形成具有 Pair_ID 的中英平行语料。最后将语料进行人工复核，筛除与研究主题关联较弱、仅作一般背景说明、信息重复明显或中英文对应不完整的内容。

经过筛查以及复核，本研究最终形成 34 组中英平行语料。分为核心语料以及辅助语料两类。其中，核心语料主要涉及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包括保护地体系、濒危物种栖息空间、具体物种命名、种群恢复、迁徙越冬、保护行动、物种记录、增殖放流、保护联盟、保护成效和国际合作等内容；辅助语料则用于说明核心语料所依托的生态价值框架、责任框架、治理理念、保护空间和国际合作语境。该处理既能保证研究对象聚焦于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又能避免孤立分析少数例句而忽视其所在的生态外宣语境。

在语料处理过程中，本研究以句群或小句为基本单位进行中英对齐。对于包含多个过程的小句，分析时优先识别其主导过程，同时保留必要的次级过程说明。这样既能避免将复杂政策句拆解得过碎，也能保证及物性分析的可操作性。

3.2. 分析框架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并结合定性细读与小规模平行语料辅助观察的方法。定性分析用于解释中英转换中的生态意义重构，辅助性词项观察用于检验典型语言现象是否具有一定语料支撑，从而降低单

纯例句分析可能带来的选择性偏差。鉴于本研究的语料规模较小, 相关词项和表达的观察仅用于支持和修正定性判断, 不作大样本统计推断。

在分析框架上, 本研究以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为总体框架, 将生态话语分析中的过程类型、参与者配置、环境成分和生态价值取向嵌入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之中。语言维重点考察译文如何通过动作过程、关系过程、言语过程和参与者重组呈现生态治理行动、保护对象和责任主体; 文化维重点考察自然观和生命观在英译中的再现方式; 交际维重点考察译文如何通过主体显化、数据保留、句式重组和合作叙事增强信息清晰度、科学可信度与国际传播效果。

具体操作上, 本研究首先依据 Pair_ID、原段号和语料属性对 34 组中英平行语料进行编号与归类, 区分核心语料和辅助语料。然后, 对中英文本进行对照分析, 重点观察三类现象: 一是“保护”“恢复”“发布”“建立”“合作”等生态行动在译文中的过程类型及其表达方式; 二是行动主体、保护对象和生态空间在译文中的句法位置以及话语功能; 三是数据和事实信息的保留情况, 如涉海自然保护区数量、保护海域面积、斑海豹越冬数量、海洋生物记录数量和增殖放流规模等。

为降低定性解释的随意性, 本研究遵循“语料证据优先”的原则, 并依据过程类型、参与者配置和生态价值取向三个维度建立诊断标准。分析时, 先识别译文如何体现保护、恢复、发布、建立、合作等生态行动, 再考察行动主体、保护对象、生态空间和国际合作在译文中的句法位置与话语功能, 最后判断相关表达是否有助于呈现海洋生态价值、强化保护责任并保留濒危海洋生物的生命性。每一处判断均按照“词汇语法变化描述-语篇功能说明-生态价值阐释”的顺序展开。对于边界不清楚或同时具有多重功能的语料, 本研究进行二次复核, 并根据其主要话语作用进行分析。例如, 含有“提出”“发布”等表达的语料既可体现言语过程, 也常与制度化保护行动相关; 含有数据和地点的语料既可作为环境成分, 也承担科学化呈现保护成效的交际功能。由此, 本研究在保留定性细读优势的同时, 提高了分析过程的透明性和可复核性。本研究的具体研究流程参考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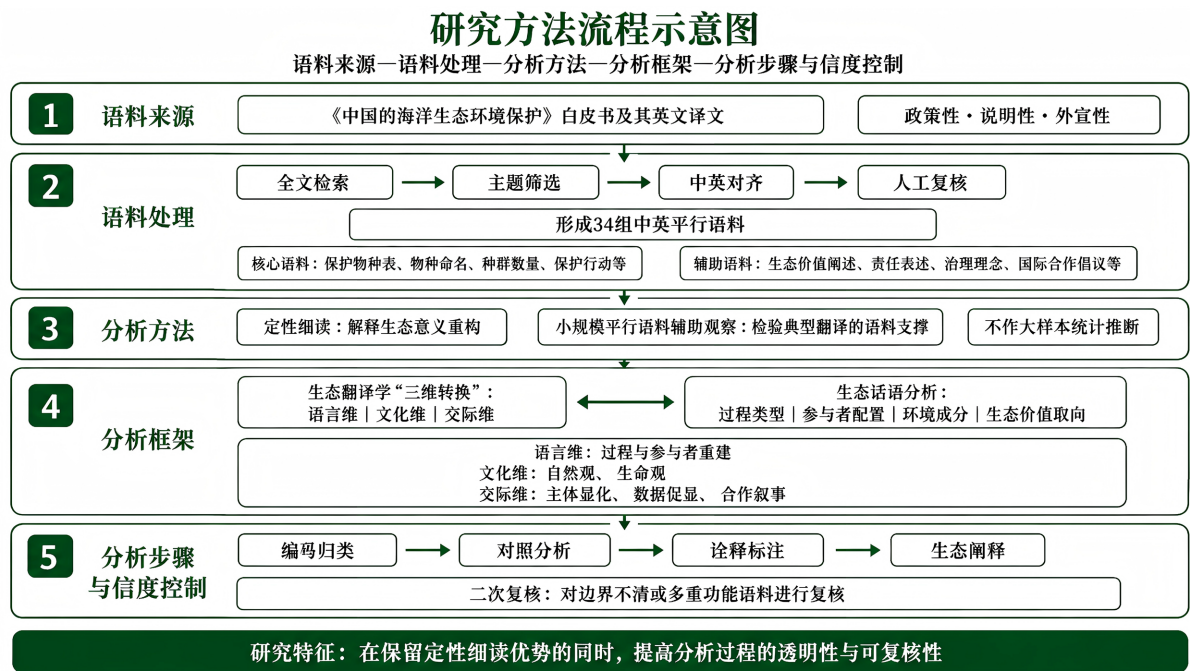


Figure 2. Flowchart of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图 2. 研究方法流程示意图

4. 语料分析

本研究举语例并不承担统计代表性功能, 而是作为机制性分析的典型证据。语例的选取主要遵循三个标准: 第一, 能够较为清楚地体现相应的过程类型或转换现象; 第二, 与濒危海洋生物保护、生态责任建构或生态外宣功能具有直接关联; 第三, 能与同类语料形成互证关系, 而非孤立支撑某一判断。因此, 语例的数量主要服务于分析, 不意味着现象只出现于该语例中。

4.1. 语言维: 及物性转换与生态责任重构

语言维关注译文在词汇语法层面的适应与选择。结合白皮书的政策性、说明性和外宣性特征, 及物性系统比单纯词汇对照更能揭示翻译转换的生态意义。及物性分析主要考察过程、参与者和环境成分的配置, 即谁在行动, 行动指向何种对象, 行动在何种条件下发生, 并产生怎样的生态结果。

从语料表现看, 白皮书英译文主要通过动作过程、关系过程和言语过程建构生态经验意义。动作过程呈现保护、治理和合作的实际行动; 关系过程确立海洋生态价值和责任归属; 言语过程引入权威理念和制度安排。参与者与环境成分虽然不是独立过程类型, 却共同影响责任主体、保护对象和治理成效的前景化方式。

4.1.1. 动作过程: 生态治理行动的连续呈现

(1a) 中国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 统筹协调开发和保护的关系, …… , 努力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

(1b) Over the years, China has given priority to eco-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pursued systematic governance. It ha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efforts, ..., striving to build a marine eco-environmen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the ocean.

(2a) 通过保护生态廊道、提高物种保护级别、开展科研监测、重点海域休渔、增殖放流等手段和措施, 对海洋生物进行积极有效的保护。

(2b) China gives effective protection to marine life by safeguarding ecological corridors, raising species' level of protection, carrying out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imposing fishing moratoriums in key sea areas, and conducting fish stock enhancement.

(3a) 中国联合他国开展海洋濒危物种研究、黄海环境联合调查、珊瑚礁监测与数据收集、海洋垃圾及微塑料污染防治等项目。

(3b) China works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endangered marine species, joint environmental surveys in the Yellow Sea, coral reef monitoring and data collection,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rine litter and microplastic pollution.

例(1)至例(3)均以动作过程为主, 但动作语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例(1)以“中国”为施事, 连续使用“坚持”“统筹协调”“构建”等过程, 形成从治理原则到治理目标的动作链; 译文以 *has given priority to, pursued, coordinated, striving to build* 对应原文, 并通过拆句使治理路径更加清晰。例(2)原文以方式成分前置, 行动主体隐含, 译文补出 *China*, 并以 *gives effective protection* 统摄 *safeguarding, raising, carrying out, imposing, conducting* 等方式性动作过程, 使保护措施从清单式罗列转化为主体明确的治理行动。例(3)中的“联合他国开展”体现合作性动作过程, 译文以 *works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carry out* 保留协同行动关系, 将中国置于国际合作网络之中。上述动作过程共同传递积极的生态价值取向。中国在译文中不是被动描述对象, 而是海洋生态治理的行动主体; 保护行为也不是单一措施, 而是由原则确立、措施实施和国际合作共同构成的连续实践。

这里的动作过程具有明显的层级性。例(1)偏向宏观治理原则, 例(2)落到具体保护手段, 例(3)进入国际合作项目。三个层级相互衔接, 使中国海洋生态保护不只是理念陈述, 而呈现为从国家治理到具体措施, 再到跨国协作的行动系统。译文通过动态动词和清晰主语把这种系统性表达出来, 因而具有较强的外宣可读性。

4.1.2. 关系过程: 生态价值与责任归属的建立

(4a) 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71%, 是生命的摇篮、人类文明的源泉。

(4b) The ocean covers about 71 percent of the earth's surface. It is the cradle of life and the source of human civilization.

(5a) 海洋生态环境关乎地球生态平衡和资源合理利用, 关乎人类文明永续发展, ……

(5b) The marine eco-environment is essential to the ecological balance of the planet, to the rational use of resources, to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

(6a)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 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

(6b) Humanity shares a common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marine eco-environment and ensur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例(4)至例(6)主要通过关系过程建构海洋生态价值和责任归属。例(4)中的“是”将海洋识别为“生命的摇篮、人类文明的源泉”, 译文以 *It is the cradle of life and the source of human civilization* 保留这一身份判断, 避免将海洋降格为单纯资源空间。例(5)连续使用“关乎”, 将海洋生态环境与生态平衡、资源利用等连接起来; 译文用 *is essential to* 统摄多个对象, 使关系意义由“涉及”转化为“至关重要”。例(6)由价值判断转向责任归属, 译文以 *Humanity shares a common responsibility* 将“全人类”前景化, 直接呈现责任承担者。关系过程不直接表征保护行动, 却为行动提供价值前提。海洋在译文中被建构为生命、文明和共同未来的基础, 海洋生态保护则被明确为全人类共同承担的责任。

此价值建构对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具有前提意义。只有当海洋被确认为生命与文明的基础, 海洋生物保护才不只是物种管理问题, 而具有伦理和文明意义。译文对关系过程的处理总体较稳健, 既保留了原文的价值判断, 又将“关乎”一类较宽泛的中文关系表达转化为英语中更明确的必要性表达。这样处理后, 海洋生态保护的价值基础更容易为国际读者理解。

4.1.3. 言语过程: 权威理念与制度安排的表达

(7a) 中国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并实施……。

(7b) China was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propose and enforce red lines for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8a) 针对重点保护物种中华白海豚、海龟、珊瑚、斑海豹发布专门的国家保护行动计划或纲要。

(8b) For key protected species like the Chinese white dolphin, sea turtles, corals, and spotted seals, the country has published special national protection action plans or programs.

例(7)至例(8)体现了言语过程与制度话语相结合。例(7)中的“提出”带有倡议性质, “实施”则嵌入动作过程, 译文以 *to propose and enforce* 呈现从提出到执行的连续链条。例(8)中的“发布”属于制度化言语过程, 译文补出 *the country*, 并将中华白海豚、海龟、珊瑚、斑海豹等重点保护物种置于句首, 使保护对象和国家制度安排同时得到凸显。言语过程在白皮书中数量不多, 但具有较强的话语组织功能。它一方面引入权威生态理念, 使“关爱海洋”的生命伦理获得明确来源; 另一方面通过“提出”“发布”等表达, 将生态保护理念转化为制度方案和行动计划。

言语过程与制度安排的结合, 也使白皮书的生态话语区别于一般环保倡议。它不是单纯呼吁公众增强环保意识, 而是通过“提出”“实施”“发布”等表达将生态理念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译文对这些过程

的正式化处理, 维持了政策文本的体裁特征, 也使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呈现出制度化、持续化和可执行的特征。

4.1.4. 参与者与环境成分: 保护对象和成效的前景化

(9a) 通过海洋保护地建设, 珍稀海洋生物种群正在逐步恢复。

(9b) The marine protected areas have enabled the populations of rare marine species to recover gradually.

(10a)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每年到辽东湾越冬的数量稳定在 2000 头以上。

(10b) For example, over 2000 spotted seals – a species under first-grade state protection – spend the winter at Liaodong Bay every year and this number has remained stable for many years.

(11a) 经多年发展, 中国已建立涉海自然保护地 352 个, 保护海域约 9.33 万平方千米, 筹建涉海国家公园候选区 5 个。

(11b) Over the years, the country has established 352 marine protected areas, which protect about 93,300 sq km of sea areas, and has made preparations for 5 marine national park candidate areas.

例(9)至例(11)显示, 参与者配置和环境成分同样参与生态意义建构。例(9)中, 中文以“珍稀海洋生物种群”为恢复主体, “通过海洋保护地建设”为原因性环境成分; 译文将 The marine protected areas 提升为主语, 并用 have enabled 建立使役关系, 使保护地从背景条件转化为推动种群恢复的制度性力量。例(10)保留斑海豹作为非人生命体参与者的行为过程, spend the winter at Liaodong Bay every year 展示其自然活动, this number has remained stable for many years 则呈现保护成效。例(11)中, 352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bout 93,300 sq km, 5 marine national park candidate areas 等数量环境成分被完整保留, 并通过 which protect 将保护地与保护面积连接起来。这些配置说明, 译文并未只关注人类行动者, 也较好地呈现海洋保护地、濒危物种、地点、数量和时间等生态要素。

从生态话语分析的角度看, 这种配置有助于避免人类中心叙事的单一化。译文既有 China、the country 等人类行动主体, 也有 marine protected areas、spotted seals、populations of rare marine species 等非人或空间参与者。不同参与者在句法中的位置变化, 反映了译文对责任主体、保护对象和生态成效的动态安排。

4.2. 文化维: 生态文明理念的跨文化再现

文化维关注译文如何处理源语文本中的生态价值观念。白皮书中的生态表达并非一般环保词汇的简单集合, 而是承载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中的自然观和生命观。译文若过度直译, 容易造成理解障碍; 若过度归化, 又可能削弱源语文本的文化主体性。因此, 文化维分析重点不在于某一词语是否逐字对应, 而在于译文是否有效保留原文所建构的人与自然、人与海洋之间的生态关系。

在自然观的再现上, 译文较明显地采用解释性转换。例(12a) “中国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统筹推进海洋生态一体保护、系统修复。”译为(12b) “China coordinates and integrates the conservation and systematic restoration of marine ecosystems in a manner that respects and protects nature and follows its laws.”其中, “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分别由 respects 和 protects 承接; “顺应自然”没有被处理为较生硬的 adapt to nature, 而是译为 follows its laws。该转换把中文生态文明话语中“遵循自然规律、避免过度干预”的哲学意味显化出来。换言之, 译文没有停留在字面层面, 而是通过 laws 明确自然自身具有规律性, 人的治理行为应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

生命观与保护伦理的文化转换主要体现为伦理化再现。例(13a) “……强调‘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译为(13b) “..., highlighting the need to ‘care for the ocean as dearly as we treasure our lives’.”这里的关键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protect, 而是 care for 和 treasure。care for 保留“关爱”的情感取向, treasure

our lives 则把“像对待生命一样”的伦理强度表达出来。由此, 海洋不再只是被管理、被修复的自然对象, 而被赋予值得珍视的生命价值。

这一部分的分析说明, 文化维并不等同于“文化负载词翻译”。在白皮书中, 自然观和生命观都通过具体词汇和句式进入译文。译文既要保持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辨识度, 又要让相关概念在英语语篇中具有可理解性。其关键不在于保留所有中文形式, 而在于保留源语文本的生态价值取向和关系结构。

4.3. 交际维: 生态外宣效果的实现

交际维关注译文能否实现预期传播目的。白皮书英译文面向国际社会, 既要说明中国海洋生态保护的具体实践, 也要使国际读者理解相关措施、数据和责任立场。有效的生态外宣译文不能只停留在理念层面, 也不能只堆叠政策成就。它需要在微观语言组织上做到清楚, 在事实呈现上具有可信度, 在宏观话语功能上建构负责任、合作型的生态治理形象。

在信息组织层面, 译文常通过主体补出和过程重组提高可读性。例(14a)“在近海海域开展增殖放流, 每年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约 300 亿尾。”译为(14b)“China carries out fish stock enhancement in nearshore areas and now releases around 30 billion fry of aquatic organisms annually.”中文原文是无主句, 信息重心放在地点、措施和数量上; 英文译文补出 China, 并用 carries out 和 releases 组织两个动作过程。同时, in nearshore areas, around 30 billion, annually 分别保留地点、数量和时间频率。这样处理后, 行动主体、实施空间和行动规模都很清楚。读者不仅知道“做了什么”, 也能看到“谁在做、在哪里做、做到什么规模”。

在事实呈现层面, 译文通过数据前景化增强科学性。例(15a)“目前, 中国已记录到海洋生物 28,000 多种, 约占全球海洋已记录生物物种数的 11%。”译为(15b)“Today, the number of recorded marine species in China has reached 28,000, accounting for about 11 percent of the global total.”中文以“中国已记录到”为核心, 强调记录行为; 英文则把 the number of recorded marine species in China 放在主语位置, 突出数量结果。这里的转换弱化了行动主体, 前景化事实数据。28,000 和 about 11 percent of the global total 使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规模具有可比性, 语气也更接近科学报告式表达。

责任形象的建构则更多依靠合作性表达完成。例(3a)“中国联合他国开展海洋濒危物种研究、黄海环境联合调查、珊瑚礁监测与数据收集、海洋垃圾及微塑料污染防治等项目。”译为(3b)“China works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endangered marine species, joint environmental surveys in the Yellow Sea, coral reef monitoring and data collection,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rine litter and microplastic pollution.”译文用 works with other countries 处理“联合他国开展”, 既保留中国的行动者身份, 也突出国际合作关系。后续并列列出濒危物种研究、黄海环境调查、珊瑚礁监测与数据收集、海洋垃圾及微塑料污染防治等项目, 显示合作内容具有专业性和多领域特征。交际维中的适应性选择并非单纯为了语言流畅, 而是服务于生态理念、治理实践和国际责任的有效传播。

因此, 交际维并非停留在“译文是否通顺”的层面, 而是涉及译文如何组织事实、塑造信任和引导理解。白皮书英译文通过数据、地点、物种名称和国际合作项目构建事实支撑, 避免单纯依赖评价性形容词来表达成效。这样的表达更接近国际读者熟悉的政策报告和科学说明文本, 也有助于降低外宣话语的宣传感, 增强其解释力和可信度。

这种交际策略与政策型白皮书的体裁要求相一致。白皮书既不是学术论文, 也不是新闻报道, 而是一种面向国内外公众说明国家政策和治理实践的权威文本。译文需要在严肃性和可读性之间保持平衡。主体补出、数据保留和合作叙事的结合, 使译文既有明确立场, 又有事实支撑, 能够较好地服务国际传播。

5. 讨论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英译文并非只是对源语文本进行词汇和句法层面的对应转换,而是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上对生态意义进行了重新组织。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与选择,生态话语分析关注话语如何建构人与自然、人与非人生命体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态关系。将二者结合后可以发现,白皮书英译中的三维转换实质上也是生态责任、生态价值和生态治理形象的跨语际重构过程。

语言维分析显示,白皮书英译文在及物性结构上具有较强的行动导向。动作过程集中呈现中国在海洋生态保护中的治理实践,关系过程建构海洋生态价值,参与者与环境成分的重组进一步影响生态责任的前景化方式。尤其是在中文无主句或方式状语前置的结构中,译文常补出 China 或 the country,使行动主体更加清楚。这种转换并不是简单的语法补足,而是外宣语篇中责任主体显化的结果。与此同时,译文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强调主体显化。部分语料通过被动结构或保护对象前置,使生态功能重要区、滨海湿地和濒危海洋生物等对象成为话语焦点。这种安排并不必然削弱责任,而是突出了保护对象本身的生态价值。

因此,语言维转换不能简单评价为“增译”或“省译”。同样是主语变化,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功能:补出 China 可以强化责任主体,将保护地置于主语位置可以凸显制度效能,将斑海豹等非人生命体置于行为主体位置则能保留其生态主体性。译文的价值在于根据具体语义关系调整前景化对象,使生态责任与生态对象同时得到呈现。

文化维分析表明,白皮书英译文对中国生态文明话语采取了较为平衡的处理方式。译文没有完全消解源语文本中的中国特色生态理念,也没有机械保留中文表达。“顺应自然”被处理为 follows its laws,使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意味更加明晰;“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被译为 care for the ocean as dearly as we treasure our lives,保留海洋生命化表达中的情感和伦理强度。这些转换说明,文化维中的适应与选择并不只是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问题,而是生态价值观念能否跨文化传播的问题。

在这一意义上,文化维转换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它要避免把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完全改写为一般国际环保话语,导致源语立场不可见;另一方面,它又要避免因术语堆叠或直译过重而削弱接受效果。白皮书译文在“自然规律”“关爱海洋”等表达上的处理,显示出较强的折中性:核心理念得以保留,语义解释也较为充分。

交际维分析表明,白皮书英译文较好地服务生态外宣目的。其交际效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信息组织更加清晰,事实呈现更具科学性,责任形象更具合作性。中文政策文本常常信息密集,英译文通过拆分长句、补出主语、调整语序,使国际读者能够较快把握行动主体、保护对象和治理措施。数据、物种名称、保护地名称等事实信息的保留,则增强了文本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值得注意的是,译文并不主要依靠宏大评价建构国家形象,而是通过具体措施、数据结果和国际合作来支撑中国生态治理形象。这种表达与生态话语分析中的“和谐”“共生发展”价值取向相契合。

此外,交际维的实现离不开语言维和文化维的支撑。主体显化使读者看见治理责任,数据前景化使成效具有可验证性,文化概念的稳定译法则为国际读者理解中国生态文明理念提供了入口。三者共同作用,才能形成较完整的生态外宣效果。若只强调语言流畅而忽视生态价值,译文可能失去政策文本的思想厚度;若只强调价值表达而忽视可读性,译文又难以有效传播。

从理论层面看,生态翻译学与生态话语分析具有较强互补性。生态翻译学能够解释译文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上如何进行适应性选择,但如果缺少生态话语分析的介入,分析容易停留在“如何翻译”的层面。生态话语分析则能进一步追问这些翻译选择如何影响生态价值、责任主体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建

构。本研究将生态话语分析的分析逻辑融入生态翻译学三维视角,使翻译研究从形式转换走向意义解释。语言维不只是句法调整,而是生态责任的重新配置;文化维不只是文化负载词处理,而是生态文明理念的跨文化再表达;交际维不只是传播效果优化,而是国家生态治理形象和国际合作责任的建构。这种融合的增量解释力在于,它既能解释译文为何进行主语补出、过程重组、数据保留等适应性选择,又能进一步说明这些选择如何改变责任主体的显隐、保护对象的前景化程度以及生态价值的跨文化可理解性。

6. 结论

本研究以《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及其英译文为语料,采用目的性抽样,并结合定性细读以及小规模平行语料辅助观察方法,在生态翻译学与生态话语分析融合框架下,考察白皮书英译文中生态意义的跨语际重构。研究将生态翻译学的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作为总体框架,同时引入生态话语分析中关于及物性过程、参与者配置、环境成分和生态价值取向的分析逻辑,说明译文如何在翻译转换中再现中国海洋生态治理理念。

研究发现,语言维上,译文通过动作过程、关系过程、言语过程以及参与者重组,较好呈现生态保护行动、生态价值判断和责任主体配置。主体显化使中国作为生态治理行动者的身份更加清晰,保护对象前景化增强了濒危海洋生物和生态空间在译文中的可见性,结果化表达进一步提升保护成效的可感性和可信度。文化维上,译文通过解释性转换、伦理化保留和术语化表达,再现源语文本中的自然观和生命观。“顺应自然”的解释性处理体现尊重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取向,“关爱海洋”的生命化表达保留人与海洋之间的伦理关系。交际维上,译文通过主体补出、句式重组、数据保留和合作叙事,增强白皮书的国际传播效果,也建构了中国作为负责任海洋生态治理主体和国际合作参与者的形象。

总体而言,白皮书英译文具有明显的有益性生态话语特征。译文在较大程度上保留并强化原文中人与海洋和谐共生、尊重非人生命体、推动全球海洋治理合作的生态价值取向。生态翻译学与生态话语分析的融合,有助于揭示翻译转换背后的生态意义,也为政策型生态外宣文本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研究的局限在于语料集中于一部白皮书,且采用目的性抽样,结论主要适用于政策型、说明型和外宣型生态文本。未来研究可扩大语料范围,将不同类型生态外宣文本、新闻报道或国际组织文件纳入比较分析,也可结合语料库方法,对生态责任主体、过程类型和评价资源进行更大规模的统计验证。

从实践层面看,生态外宣翻译需要在准确性、可读性和价值表达之间保持张力。过度直译可能削弱国际可理解性,过度归化又可能消解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主体性。本研究所考察的白皮书译文表明,较为有效的处理方式是在关键生态理念上保持稳定表达,在复杂政策信息上进行结构重组,在保护成效上使用数据和事实支撑,在全球议题上突出合作治理与责任分担。上述策略对于海洋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同类外宣文本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R/OL]. 2024-07-11. http://www.scio.gov.cn/zfbps/zfbps_2279/202407/t20240711_854789.html, 2026-06-24.
- [2] Alexander, R. and Stibbe, A. (2014) From 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to 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 *Language Sciences*, 41, 104-110. <https://doi.org/10.1016/j.langsci.2013.08.011>
- [3] Stibbe, A. (2015)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Routledge.
- [4] Stibbe, A. (2012) *Animals Erased: Discourse, Ecology, and Reconnection with the Natural World*.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5] 何伟, 张瑞杰. 生态话语分析模式构建[J]. 中国外语, 2017, 14(5): 56-64.
- [6] 何伟, 魏榕. 国际生态话语之及物性分析模式构建[J]. 现代外语, 2017, 40(5): 597-607, 729.

-
- [7] 黄国文. 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到和谐话语分析[J]. 中国外语, 2018, 15(4): 39-46.
- [8] 赵蕊华, 黄国文. 和谐话语分析框架及其应用[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53(1): 42-53, 159-160.
- [9] 李珂. 绿色语法视角下生态关系的话语建构[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46(2): 104-118.
- [10] 苗兴伟, 李珂. 主体间性视角下生态身份的话语建构[J]. 英语研究, 2022(2): 154-165.
- [11] 匡芳涛, 郭璨, 邹秀佳. 汉语野生动物保护类标语及物性过程的生态话语分析[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 22(1): 111-121.
- [12]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13]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14] 胡庚申. 翻译研究“生态范式”的理论建构[J]. 中国翻译, 2019, 40(4): 24-33, 188.
- [15]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虚指”研究与“实指”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4(6): 117-126, 159.